

社會主義者的多重實踐： 楊逵的社會運動與文學活動

演講者：黃惠禎（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教授）

主持人：陳萬益（清大台文所退休教授）

時間：2024年5月8日18:30-20:30

側記：呂函螢（清大台文所博士生）

側記內容

黃惠禎老師透過分享自己如何進入楊逵研究，以及楊逵的時代背景脈絡開展這場演講。她認為她的研究是用更多的史料，在證明林瑞明老師的前行研究：楊逵是簡單的，複雜的是時代。在整場演講過程中，她也不斷提出發想，再進行辨證並且自我批判省思，以提出新的解方或檢視得到的幫助，因此她認為研究楊逵的這條路，也是一條追尋自我認同的路。時至今日，她可以自豪地說自己研究楊逵，也自我認同身為閩南人，並帶有客家人血統的事實。

鑒於楊逵孫女楊翠老師已經來演講過，同學們具有對楊逵生平的初步了解，黃惠禎老師更聚焦在某些關於戰後初期的議題，以及個人與楊逵的交集。首先老師提到自己在求學的年代，並未有台灣文學專門系所，而申報碩士論文題目正好知道楊逵文獻的出土，因此就選定了楊逵作為研究主題。十分幸運地是當她向楊逵之子楊建商借楊逵手稿時，楊建老師居然答應了，而當時的她尚未意識到這是一件多麼艱難的任務。雖然知道楊逵是日治時期成名的作家，但她未曾想到手稿必然也有全日文的書寫，因此當老師興高采烈地捧著手稿，打開一看的瞬間，只覺得想哭——因為她完全不會日文。於是她耗費一年的時間，壓縮自己，密集學習日文，務求能夠整理楊逵的手稿資料。而這樣的投入與付出，也造就她的碩論成為少數得到文建會補助出版的成就。她也提到一般主張要和研究對象及其家屬保持距離，以免論述有失客觀這件事，但其實她和楊建、楊翠父女都有相當深厚的交情，楊逵家屬會主動提供史料，也從未干涉論點，她所受到來自楊逵家族的影響是正面的。



接著，她談到楊逵其實是相當有彈性的一個人，在楊逵心中沒有國家的框架，可以獨立行動，也可以在各種不同的陣營中尋找盟友，並不是那樣非黑即白的狀態。例如楊逵曾經參加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，發生二二八事件以後，由於對國民黨失望便轉向中國望去。後來，楊逵發現中國並非他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國家，他也一樣失望了，於是更積極想要捐贈自己的土地，用來推展台灣文化的整理與傳播等志業。1982年訪問美國回來後，他一再表示反對獨裁式地把台灣和中國大陸統一合併，而是贊成透過說服和了解的民主形式的統一。黃老師認為這種主張類似今天說的住民自決，楊逵希望透過台灣人的住民自決來決定台灣的前途。

她也提到楊逵有許多和一般人想像中不同的地方。就如日本時代他並不是只會日文，其實他也曾經嘗試用台灣話文創作，因為他希望能夠使用人民的語言創作，甚至賴和也曾幫他修稿，但因假借字太多，後來連自己都看不懂，只好放棄。戰後中國政府大力推行國語運動時，楊逵又回到台灣話文的寫作，用簡短的歌謠批判執政者的統治不當。而他記錄1935年大地震的報告文學，選在東京發表，是有意向日本人揭發災情如此慘重的原因，都是因為台灣人過得不好，藉此告訴日本統治者：「你的子民過得不好，是你的責任」這件事。另外，家境貧困的楊逵其實是行動力非常高的人，戰後初期創辦《一陽週報》時缺乏經費，他甚至利用回收的廢紙，油印發行了二次大戰後台灣的第一份雜誌，落實他發展文化事業的理想，推動台灣的去日本殖民地化、選擇性的中國化，以及建構臺灣主體性的理念。

黃惠禎老師認為楊逵最重要的小說創作有三篇，第一篇無庸置疑是〈送報伕〉，那是楊逵最核心理念的展現，認為不分族群團結被壓迫者可以反抗成功。第二篇是〈鵝媽媽出嫁〉，這篇是他藝術成就造詣最高的小說。第三篇則是原題〈春光關不住〉的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，主要呈現被關在綠島監獄時他的精神自由。這裡因為談到轉型正義，所以也穿插了一段小插曲，講到她與楊逵後代的相處過程。本來是她只想知道研究對象的後代過得如何，於是會致電關心並和楊建聊天，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發現其實她是可以訪談楊建的。在和楊逵後代來往的過程中，她了解楊建如何看待父親楊逵，也看到了白色恐怖對於政治犯本人、政治犯家屬的傷害，那是獄外的牢籠。

而今天演講所要回頭叩問的是，為什麼現在的我們還要閱讀楊逵？楊逵文學的當代意義為何？黃老師說：因為內部紛擾與外部霸權的威脅之下，我們仍在通往公平、正義、民主與和平的道路上，奮力前行。尤其我們的民主依然很脆弱，公平與正義也尚未實踐，因此我們需要閱讀楊逵，那也是楊逵文學的當代意義。而且楊逵的文學中不是只有台灣，還有世界性的關懷。楊逵自己則是社會主義者，他所有的行動都是實踐改革社會的理念，包含他的文學。